

描述视域下《三国演义》邓罗译本比较研究

沈高阳 张志云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摘要] 近年来,关于清末海关洋员的汉学研究及翻译著作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邓罗于1889-1892年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三国演义》节译,反响斐然。1891年,他入职海关,并凭借其优秀的汉语水平,于数年间迅速升迁至税务司。邓罗前后共翻译了两版《三国演义》,译文的差异展现了译者身份与翻译态度的转变。本文拟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从邓罗本人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出发,比较他的前后两版译文,进而阐释其文化身份与翻译目的的变迁过程,并由此推及海关洋员中的汉学家、翻译家群体所具备的文化身份及其转变进程上的共性。

[关键词] 《三国演义》; 邓罗; 描述性翻译研究; 海关洋员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22)04-0060-07

1. 引言

《三国演义》(简称《三国》)不仅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也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与载体。自清末至今,不同语言的《三国演义》译本层出不穷,其中仅英译本就有邓罗(C. H. Brewitt-Taylor)、虞苏美、张亦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罗慕士(Moss Roberts)等译者翻译的前后十余版,且各个译者身份与翻译目的皆有所不同。琳琅满目的《三国》英译本引来学者基于不同学术考量的翻译比较研究,其中绝大部分学者聚焦于字里行间的措辞与美学比较,少数提及文化身份与翻译目的的差异,但基于译者特质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本文将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对《三国》的两个邓罗译本展开比较探讨。

2. 邓罗对《三国》的两次翻译

邓罗于1891年开始于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任职,职业生涯早期便涉足翻译,并于各汉学杂志发表译作。数年间,邓罗先后于《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发表《三国演义》节译数篇,分别对应原著第二十九回“孙策遇刺”、第六十八回“左慈戏曹操”、第八回“王允巧施连环计”。1925年,别发洋行出版《三国演义》邓罗译本,1959年塔托出版社(Tuttle Publishing)再版,并附加了罗伯特·E·海格尔(Robert E. Hegel)所撰引言。该书分两卷,翻译参照的母本为

毛宗纲评本《三国演义》(即毛本《三国》)。

3. 语言水平精进之于翻译文本面貌

通读《中国评论》中邓罗《三国》节译三则,并与1925年版《三国》译本相比较,无论是翻译文本的表现形式、行文构思、文本细节把握与选择性呈现,还是译文中对小说文本、人物情感、情节跌宕的理解与翻译实践,皆相迳庭。其间邓罗汉语水平的精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比较两版译文,首当可见邓罗本人汉语语言水平的提升。两译本有明显的翻译差别,处处可见邓罗译文中精益求精的考量与改进。例如,《三国演义》原著第二十九回中,孙策之母吴太夫人闻得孙策意欲拘禁于吉,故“……唤孙策入后堂,……”邓罗于《中国评论》1889年第三期(后文简称“第一版”)译为“... she sent him for one of the private apartments...”(Brewitt-Taylor, 1889: 148)

1925年版《三国》译本(后文简称“第二版”)则译为“... she sent for her son to the ladies' apartment...”(Brewitt-Taylor, 1925: 330)

第一版割裂了“后堂”中的“后”字,附会“私下说”的意义。第二版做了修正,可见对我国古代女性的居住习惯有所了解:后宫、后堂既可谓屋后之庭院,又可指妃子、夫人之居所。“遂见宠异,常居后堂”,即马皇后十三岁因服侍阴皇后得体,上下相安,故获宠入后堂内室而居。审慎推敲,此情境下吴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关通史”(编号:21&ZD220)。

[收稿日期] 2022-01-19

[作者简介] 沈高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清末海关史、中国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张志云,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海关史、帝国史。

太夫人意欲劝阻孙策之暴行,必选一私密之处,一则幽静体己,二则保全孩儿之颜面,故夫人的居室显然比后庭更为合理。两版译文中邓罗都考虑到了“private”这一层面的含义,故此精进应归功于译者汉语水平的提升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提高。

又如,吴太夫人恰闻孙策不分青红皂白关押于吉之时,唤之质云“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縲继,……”第一版译为“... laid hold of Yu Chi and thrown him into a dungeon. ...”(Brewitt-Taylor, 1889: 149)

第二版译为“... put the Taoist in bond. ...”(Brewitt-Taylor, 1925: 330)

究其原文,下与縲继二字各有其义,下曰入狱,縲继则为捆绑犯人的黑绳索,乃借代之义,借指监禁。两版之中其实都译出了监禁之义,但第二版中的“put... in bond”与“縲继”在汉语中的表义机制可谓异曲同工,以字面之义表喻义,体现译者对翻译细节的考量,能够反映作者在汉语理解上的余力。对于刚到中国几年的邓罗而言,首次处理生僻的文言词语翻译,大抵以研习为主。而最终熟练地通过中英文的语言现象转换,创造性地呈现原文的艺术效果,不仅是盈千累万的字词研习积累的结果,也是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现象认识质变的集中体现。

再如,吕范顶着孙策怒火谏言,给予吉一个祈雨自证仙力的机会。当街百姓称“若有灵验,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怅然回道“气数至此,恐不能逃。”仅就“‘若有灵验……’……‘气数至此,……’”部分,第一版译为“‘But if you succeed...; 'Tis so ordained, ...’”(Brewitt-Taylor, 1889: 149)

第二版译为“‘But if your prayer be efficacious... The day of fate...’”(Brewitt-Taylor, 1925: 331)

对于“灵验”一词,早年邓罗的理解稍欠细致,而第二版的 *efficacious* 一词展现了邓罗对该词理解的进步。*efficacious*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 *efficacia*, 该词不仅含“有效”之义,还带有宗教力量的潜在含义。例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 *Catena Aurea* (the golden chain) - *Gospel of Matthew* 一书中曾讲到“*sementiva ineuntis Spiritus*”(The sowing(s) of the original spirit) 是“*efficacia*”的,可见其饱含神性。(Aquinas, 2015) 邓罗意图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宗教现象,兼顾该词中“灵”字的含义,彰显该情节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相比之下,“气数”一词的本土文化因素更加浓厚。第一版中对“气数”

的转译有较显著的基督教文化因素,而第二版中的“fate”实属精髓。“气数”最早代表二十四节气的循环,是万物生长的周期性节律。《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记生化之用也。”古典文化常讲“气运”,实为气数与命运。生命有限,气数便无以永恒循环,这就是命运。故而《梦溪笔谈·象数》云“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fate”一词,足见邓罗对于“气数”一词的深刻认知。

除“The Death of Sun Tze”这篇节译以外,其余两篇中亦可见较多此类现象。但相比而言,其余两篇译文的叙事方式与原著稍有差异,故不宜与第二版文本进行文本细节的平行比较,却仍依稀可见邓罗对于汉语掌握与理解程度的精进。海关对洋员的汉语能力教研、考核体系,伴随《中国评论》等侨居地汉学刊物对汉语古典文学译介的推动,是这一变革的重要原动力,最终成就了邓罗 1925 年版的《三国》译本。

4. 文化环境与翻译态度的影响

如前所述,邓罗《三国》译本大致完成于 1910 - 1920 年之间,距其发表于《中国评论》上的初版节译相隔二十余载。经过近三十年的辗转,《三国演义》英译本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已大有改变。“五四运动”之后,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新文学”风潮,表现为与新文化相一致的反传统、取西经的价值诉求。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趋向主要是致力反映、表现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人的命运、意识、情感,直接体现科学、民主与反封建精神。(夏志清 2001) 邓罗深知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对传统小说的看法,故而在其序言中讲道:

伟烈亚力在其《中国文献记略》中讲道“小说著作构成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绝非中国一家个案。经过欧洲思想文化洗礼的人谈及此事,亦必坚言传奇与小说文体的重要性。历朝历代,如是著作形塑着民族风尚与意识,雕琢着语言特性与风华,也是老百姓了解本民族历史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尽管当下学界对此偏见良多,这些著作所造成影响之举足轻重又怎容忽视。《三国演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Brewitt-Taylor, 1925: Preface)

从邓罗所引伟烈亚力之言可见,其翻译目的乃向英语世界的国家民众输送久被忽略的,集历史、传奇、文学为一体的文化砥柱性书籍,并惠及当时中国的英文读物爱好者。长期的汉语教学工作与相关书

籍编纂经历,以及海关职业生涯中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亲密接触,使邓罗逐渐形成了一种桥梁式的文化关怀心态。同时,这样的职业经历也使一个从大英帝国文化走来的海关洋员,得以从均平的视角,关怀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中所蕴含的文化现象,并倾注于《三国演义》译本及其他著作的字里行间。

而邓罗在1890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的对《三国演义》的评论性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理解与关怀却有所不同。文章开篇即已表明邓罗对《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势力博弈与人物关系的基本认识:

在朝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下,统治中原四百余年的汉朝终难逃陨落之命运。四方枭雄皆以复兴汉室之旗号,汲汲问鼎中原。……各方势力均无力揽权怙势,予夺生杀,又皆付机难轻失。……众家皆自明者,夫侥幸出手得卢,王也,倘弗幸功败垂成,寇也。(Brewitt-Taylor, 1890: 168)

此后,邓罗提及陈寿的《三国志》,并阐释他所理解的两部著作之不同,即《三国志》“所见虽真实可信,却佐以非凡神奇之状”,而《三国演义》则更具历史真实性。虽然清晰地认识到《三国演义》的史学价值,但对于邓罗而言:

纵使前人极尽盛赞,我却不得不说,全书篇幅很长,充斥着冗长的叙述与对话……描述稀少,而你言我语、唇齿相讥的桥段却多如牛毛……绝大部分情况下,原文句子结构比较简单,宜逐字逐句翻译……(Brewitt-Taylor, 1890: 178)

相比文学价值,19世纪末的邓罗更青睐《三国演义》在史实考据上的价值。而《中国评论》发表的几篇节译都未涉及原文中的咏古诗与回末语,对原文的转译与改写亦倾重故事情节的叙述,弱化人物对话与场景描写,未能站在东方人的视角上审视该著的文学与文化价值,仅以西方的文学现象、著作特征衡量《三国演义》的得失。此时的邓罗应未充分意识到《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其翻译目的并非将代表中国语言文化符号的中国传统文学著作向西方世界传递,而是学术与成果交流的范畴。当然,1925年版《三国》译本中也有改写和创造的成分,但这些细节反而凸显了该版译本的翻译目的与译者身份。在前言中,邓罗写道:

《三国演义》是一本蕴藏浓厚东方气息的著作,经过(对真实历史情节的)改编,文本富含故事性与戏剧性,可谓绘声绘色。文中随处可见的各色人名、地名令人应接不暇,东方的读者、听书者却百览不

厌。幸而英语语言中的代词功能足够强大,取代了原文(对西方人而言)拗口的姓字地名……为减轻西方读者的压力,译者尽可能替代或省去一些非核心人物的表字。(Brewitt-Taylor, 1925: Translator's Note)

事实上,在《三国》译本中,邓罗不仅替代、省去了部分人物的表字,还简化了一些与主线情节关系不大的人物的称谓与三国时期的地名。例如,“忽闻张纮有使者自许昌回”中的“许昌”,第一版译文译为“Hsu Chang”,而第二版则译为“the capital”。第一版译文一般将于吉译作“Yu Chi”,第二版则常译为“the Taoist”。《太平青领道》一书的译名也从第一版的“The Great Peace and Natural Law”转变为第二版的“The Way of Peace”,更加简洁易懂。

而在情节叙述方面,《三国》译本非常重视人物间对话与其间博弈的描述。与《中国评论》的三篇节译相比较,以“王允巧施连环计”部分最是典型。第二版译文开篇便详细描写了王允与貂蝉的对话,凸显人物及彼此矛盾复杂的情感,为后文渲染哀伤而无奈的心理气氛。此后,王允与吕布、董卓间的对话,清晰展现了王允施展计谋的完整过程,丰腴情节之际,彰显王允善用人情,为除奸佞不择手段之态。例如,当吕布问及为何受拜于王司徒时,王允答道:“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也。”对此,第二版《三国》译文如下:

“Because in the whole land there is no warrior your equal. Poor Yun bows not to an officer's rank; he bows to his ability.”(Brewitt-Taylor, 1925: 83)

上述人物话语使用了全书极少出现的第三人称,成功刻画了甘为奴仆的谋者形象:极尽谦卑与恭敬,城府雕颜而不察。而貂蝉假装不经意进来时,吕布满脸惊异的样子,第二版也予以详细描述,这与第一版截然不同。(Brewitt-Taylor, 1925: 97)此后酒酣之时,王允说“本欲留将军止宿,恐太师见疑。”这句话在第一版翻译中完全省略,而第二版中则有较完整的描述。此后王允蓄意挑起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嫌隙,特意“趁吕布不在侧”邀请董卓前来寒舍一叙,此间对二者对话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反间计”的精髓。以上第二版诸多细节所表达的艺术效果,都是第一版未实现的。这既说明了邓罗对《三国演义》故事情节与文本深度的认知,也证实了他对该著文学价值的认同。

5. 译者身份形塑的文本“前理解”

从翻译诠释学的角度讲,原著文本是实在或虚

幻的客体附以原著者主体性的产物。因此,从译者角度反映的原文本的内涵是相对开放的,文本本身在被理解之前应视作具备自我解释的功能。描述性翻译批评正是揭示这种译者对既有文本的“前理解”,并阐释后续形成的“视域融合”的内在机理。它注重译者所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其实质即为文本比较设置一个可立足之平台,不至于做出背景、身份、历史语境皆不对等的缺乏意义的文本比较。

投身中国的岁月间,相当一部分洋人看待异域文化与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跨文化身份随社会环境、历史现实、所处文化圈的氛围与特征、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而糅变。许多洋员并未边缘化于华夏文化圈,且出于各自的动机,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不同文化身份的融合与重构。邓罗家境平庸,其家庭充其量属于工人阶级。因而,相对于贵族出身的洋员而言,他对于中国文化态度中原初的、固化的价值因素更少。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逐步深入,邓罗的文化身份与译者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着他对《三国演义》原文本的“前理解”。

例如,《中国评论》1890年发表的“左慈戏曹操”节译定名为“conjuring”(施法、异灵),并在故事情节之前介绍道:

在中国的著作中总会出现一个道士。这个人往往在神秘、非凡的事件中扮演主角,独与神力相联结。直至电话、电报盛行的今日(中国也已进入铁路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旧相信‘道可道,非常道’的神秘力量。(Brewitt-Taylor, 1890: 126)

真正体现译者的文化、社会价值判断的,往往是潜意识投射到译文文本中的一些细节。19世纪末,邓罗对《三国》的译介态度仍未充分定型,此时译文中的诸多细节更能体现他的文化身份与态度、倾向。通过两版译文对比,可排除译者本人语言习惯等影响的可能性。由该时期发表的节译中诸多细节可见,当时邓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看法暂存极端化现象。例如“孙策之死”部分节译中孙策之言“此乃妖人,能以妖术惑众,不可不除!”译为“... He is one of those conjuring fellows, who upset the people with their tricks...”(Brewitt-Taylor, 1889: 149)。第二版则译为“He is simply a wizard who upsets the multitude with his spells and craft.”(Brewitt-Taylor, 1925: 330)相比第二版而言,复数形式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性现象的反映,单数形式的终版则更为冷静、更贴近原文表达。这既体现了久居中国后邓

罗对本土文化意识的转变,也体现了文学译者态度的精妙变化。

《三国》此回原文还曾提及于吉所著《太平青领道》。对于此著书名,两版翻译皆有转译,均非直译,但方式大有不同。换言之,身处不同时代的邓罗,通过不同深度的理解,以差异化的方式将此著内容与精神外化于译名之中。《三国》中述及《太平青领道》的原型实为黄老之学著作《太平清领书》,《三国》中传乃神宿赠予方士于吉。历史上,冠“太平”之名的道派主要分为于吉的“青领太平道”与张角领导的“黄天太平道”。(丁培仁, 2006)“围绕太平经阐释这一基本问题,出身农民阶级、属于老年人群、籍贯琅邪附近的于吉一派,主张在政治上以改良辅佐汉廷、在信仰上尊崇苍天之神、在传教上推行单元方式;……”(朱永清, 2019: 5)关于此书书名,邓罗在第一版译文中译为“The Great Peace and Natural Law”,显然误读了“青领”一词含义。该词包含两方面内涵,其一即义同“青衿”。《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而《毛诗故训传》中则释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青领变成了文士、学人的代称。此外,“青”代表写经文本的颜色,而不同的颜色蕴含不同含义,青象征着为君者所抱仁者之心。无论《太平青领道》或《包元太平经》等都是太平经系的一支。因而邓罗《三国》译本中的翻译,综合考量了书名含义、背景与文化转构现象中的“精简”原则,译为“The Way of Peace”。由第一版译名的译者考量可见,第二版的简化与“way”的译法,绝非无意而为之。经过将近30年的清帝国洋员生涯,邓罗显然对于“道”字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

6. “目的因素”略窥罗、邓译本

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研究具有很强的经验科学属性,而经验科学往往不擅于抛出终极论断。也正因如此,翻译研究较易堕入自说自话的困境,非“描述”属性不能挽救之。该领域自创生之日始,便打上了“规约性”的烙印,以既定系统和既定规束,针对“真实世界”中的断裂性残片展开论述。这种既定的系统与规束充斥着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也使其“科学性”中蕴藏了“相对不科学”的部分。翻译研究属语言、文化研究范畴,但无论社会科学抑或纯语言研究,首先要解决“事实与价值”辩证关系的问题。除研究者暗含的价值观外,“好奇心与趣味性”“实际价值与意义驱动”等因素都会是翻译研究“科学性”“历史真实性”的反作用力。其间,“描述性翻

译研究”对于中和上述趋势并客观地对目的语文本与译者展开阐释、批评,弥补理论的既有缺陷等,都大有裨益。

因而,理解翻译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可使研究更贴近历史现实。这种方法论上的可能性是翻译研究向经验性以外领域的扩展。毕竟,从研究客体的层面看,翻译研究应不囿于基于既有翻译理论与文化承移模式的单纯推断。翻译现象与时空下现实生态、文化群落密不可分。

在翻译研究中,对翻译文本及其间语言、文化元素的考据,都先基于研究者视域,故而易被研究者价值、情感等因素所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无疑促成了源文本向译文本的创造性跳跃。然而,对于比较翻译研究而言,对该过程的重构胜似盲人摸象——一支支离破碎的象。若欲将此象重新组装起来,研究者需基于历史背景、译者境遇、文化环境以及更加微观的似然心理活动、印象作用等等,对翻译活动的情境输入与输出进行剖析。简言之,翻译研究是从可视现象推及不可视因素的情境重构,而描绘性方法显然是接近事实的必由之路。

关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1982: 25)指出“描述性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翻译研究者所贯彻思想内核截然相反的基本假设,即任何翻译研究——无论是局限于翻译文本,抑或意图重构译者翻译进程的研究——必须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目的因素’是翻译现象的唯一决定因素。”他将影响翻译研究路径的因素分为“译源因素”(source system)“目的因素”(target system)与“特殊因素”(special system)。其中,“译源因素”是规约性翻译研究所注重和推崇的。一般描述性翻译研究认为该种侧重将翻译现象的“源与流”因果倒置了。毕竟,译文生于源文本之后,不能对源语言的习惯、用法产生先决影响。翻译行为只对目的语言受众、文化圈、语言习惯产生先决影响,故最理想的研究方法是借由翻译进程,洞悉译者的翻译目的,藉此解剖整个译文文本与翻译现象。

有关邓罗《三国》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学界,其中包含相当部分的比较翻译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将邓译本与罗慕士的《三国》译本置于同一语境下展开,基本属于“规约性研究”范畴。从描述性研究的角度讲,缺乏同质性的译者与译介不宜比较,强行同境化会使得研究或浮于文本比较阐释,或作出抛弃翻译背景的非同类价值论断。上述研究

绝大多数呈现此状。部分研究空谈两位译者译介中的美学造诣之高下,甚至直接对两版《三国》译本下价值定论。这类研究都属于“规约性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所暴露的问题亦可推及部分《三国》邓译本的专门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王文强的研究更接近描述性研究,提出将邓罗与罗慕士的译著置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并探寻其翻译目的,本文的主张与其类似。(王文强,汪田田, 2017)

罗慕士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却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我研究生阶段继续选择学习汉语,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力量的驱动,一种使命驱使我要让美国了解真正的中国。”(刘瑾,罗慕士, 2018: 78)此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期,乃战后美国社会对新中国意识态度剧烈动荡之重要历史时期。50年代初,美国民众普遍不愿承认社会主义政体的新中国,甚至将共产党人定义为侵略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三年间,美国公众更是敌视中国,将美国政府的战争责任转嫁于中国。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不愿与中国平等交互,固守“反华政策”。而随着日内瓦会议中国表现出对美友好态度之后,媒体、商界对中国的向往日益迫切,这也带动了美国文化与学术界对中国态度的转向,从不了解、固态化的价值判定到主动的认知与理解。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70年代中后期,罗慕士开始《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1981年,外文出版社正式邀请他参与《三国演义》翻译,他也于1983年9月前来北京任职《三国》译本外文专家。为此,外文出版社还组织大量中方翻译专家辅助罗慕士的翻译进程,其中便包括著名翻译家任家楨(审稿人)。(Robert, 2019) 1984年,翻译工作完成。1991年,该译本由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可见,从“目的因素”与“特殊因素”的角度讲,罗译本与邓译本的翻译目的与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两译本虽都蕴含“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基本目的,但邓译本诞生于帝国列强侵略中国、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渐见下行的历史阶段,乃逆流而上;而罗译本则顺历史之潮流,顺应战后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迫切需求。另外,时代与环境的差异也使两译本的译注难度截然不同。从罗慕士1976年节译本与1991年联合出版译本的差异来看,中方外文专家与其间数十年的各方变迁,对1991年版罗译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换言之,罗译本更应视作罗慕士与众多中国外文翻译专家的智慧结晶。

7. 结论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海关洋员中的汉学家无论在生活史、观念契机抑或文化态度上都存在相当的共性。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至少来自几方面:一、外交官、传教士身份的父辈对中国与远东地区的关注及对汉文化的兴趣;二、工作性质决定的与中国社会生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及了解属地文化的需求;三、对中国古典文化、历史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兴趣。(滨下武志,2016)

客观需求向主观诉求的转变是海关洋员群体与汉文化间供需关系的共同演化模式。文化的传播者与源群体、目的群体之间应存有部分属性的同质性。海关洋员群体在长期异国他乡的工作经历中,逐步跳脱了单一本根的文化身份,发育出与受播群体之间的文化符号相性,委明其状地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播者的责任。与此同时,该群体与中国文化间的异质性亦不容忽略。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传播者对源文化的主观价值判断,以及贯穿传播过程的批判性逻辑。故而,规模并不庞大的海关洋员群体中大量涌现出精专不同领域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同”与“异”双因素共同作用下,该群体得以相对淡化文化传播进程中的“西方中心”倾向,以积极、崇敬、求知的态度对待千年古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由“化外”移步“化内”,无复叶障其目、好丹非素。

上述供需关系的演变极大影响了邓罗对《三国》文本的前理解。作为译者理解功能的前提,这种前理解构成了邓罗对中国古典名著的特殊视域与积极的价值观取向。“邓罗视域”与“三国视域”实现“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进程催生了不断变化着的“效果历史”(history of effect)。第一版节译与第二版译本之间的差别,既体现了邓罗本人的行为轨迹,诸如升迁、文著等对汉语水平的促进作用,也揭示了译者翻译态度的转变。故研究者更需关注译者固化的西方价值观念向本土化思维、工作需要向对汉语文化的真切关注演进的过程。第一版书稿烧毁使得邓罗《三国》译介的进程产生断裂,却更加彰显其译者身份之嬗变。其中翻译处理的诸多细节性变化,便不宜视作逐字、句的矫枉过正,而应归因于更宏大的汉文化考据素养的提升与译者精神内核的进化。

“翻译研究活动及其产物也是目标文化研究领域中填补自身缺失的那一汪‘新泉’。”(孙艳,张旭,2022:55)因而以描述性研究手段诠释清末洋员群

体的翻译成果,既是查缺补漏又属推陈出新。影响邓译本的“效果历史”与其他译者译本截然不同,故需采取描述性诠释以求更贴近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译者、真实的关怀。另外,邓罗等人译者身份的转变,亦可类比于更宏大论题——西方视野打破政治话语桎梏,进而更客观地看待更真实的中国文化、中国现象。对任何一种政治、文化意涵的理解,都是特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前理解所催生的有限话语。不仅译者如是,话语、文化的转述者亦如是。当代中国典籍向世界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文学外译也是中国文化外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力途径,能使世界更真实地了解我国的国情、民情,实事求是地向全球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从外宣与国策、外交政策对接方法论的角度看,“洋员外译中国传统文学”案例应能从特定“译者身份”创造性实现文本转换的层面,为此提供借鉴。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对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核心与外延有深入理解,也要着眼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重点关切。语种转化之际实现上述文化传播诉求,可谓当代译者正在面对或理应重视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 [1] Brewitt-Taylor, C. H. How snow inspired verse and a rash order made the flower bloom [J].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5(1): 81-85.
- [2] Brewitt-Taylor, C. H. The death of Sun Tze [J]. *The China Review*, 1889(3): 147-151.
- [3] Brewitt-Taylor, C. H. Conjuring [J]. *The China Review*, 1890(2): 126-128.
- [4] Brewitt-Taylor, C. H. The San-kuo [J]. *The China Review*, 1890(3): 168-178.
- [5] Cannon I. C. *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1857-1938)*,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Pioneer Translator*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6] Lo Kuan-chung.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 Brewitt-Taylor, C. H. (trans). 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Co, 2002.
- [7] Roberts, M. trans. *Three Kingdom*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9.
- [8] St. Aquinas T. *Catena Aurea-Gospel of Matthew* [M]. William Whiston (trans). Scotts Valle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译者、评者与读者: 毕飞宇在法国接受的三维透视

李 巍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 中国文学外译要“走出去”更需要“走进来”。翻译是个不断生成的过程,需要翻译、批评与接受的良性互动。本文基于译者、评者、读者三个不同维度,在对毕飞宇文学作品法译本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从关注焦点、媒介评论、文学感受等层面对毕飞宇在法国的接受现状进行梳理与简要分析,提倡译者及批评家对大众读者的积极引导。

[关键词] 中国文学外译; 引导; 毕飞宇; 读者; 法国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22)04-0066-06

1. 引言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毕飞宇在西方世界受到普遍好评。然而,与多数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译之路不同,毕飞宇作品的外译并非始于英语,其首部外译小说《青衣》(毕基埃出版社, Claude Payen 译)于2003年在法国出版并受到好评,法国成为毕飞宇作品外译的滥觞之地,奠定了其向欧美译介的坚实基础。毕飞宇对法国有着特殊的情愫:“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毕飞宇)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发。”(高方,毕飞宇,2012: 49)继《青衣》之后,毕飞宇先后有六部作品在法国问世,分别为2004年出版的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南方书编出版社, Isabelle Rabut 译)、2005年出版的小说《玉米》(毕基埃出版社, Claude Payen 译)、2007年出版的小说《上海往事》(毕基埃出版社,

Claude Payen 译)、2009年出版的小说《平原》(毕基埃出版社, Claude Payen 译)、2011年出版的小说《推拿》(毕基埃出版社, Emmanuelle Péchenart 译)、2016年出版的非虚构性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毕基埃出版社, Myriam Kryger 译)。

从作品的选择到翻译活动的展开,毕飞宇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主要出版社为毕基埃出版社,主要译者为何碧玉、Claude Payen。毕飞宇被认为是“最受法国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高方,毕飞宇,2012: 52)。法国文学评论界也对毕飞宇予以了充分肯定,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认为“毕飞宇的作品通过一个个生动自然的人物,展现出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许钧, 2018: 131) Pierre Haski(2016)评价毕飞宇是“他所处的这一时代中最好的作家之一”。在亚马逊法语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毕飞宇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研究”(编号: 20WXB006)。

[收稿日期] 2022-03-18

[作者简介] 李巍, 博士,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 研究领域: 翻译学、语言学。

[9] Toury, G. 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J]. *Dispositio*, 1982(7): 23-39.

[10] 滨下武志. 海关洋员回顾录和第二代海关史研究 [J]. *国家航海*, 2016(3): 200-210.

[11] 丁培仁. 求索集: 丁培仁道教学术研究论文集 [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12] 刘瑾, 罗慕士. 钻研中国文化 倾情翻译中国——《三国演义》英译者罗慕士访谈录 [J]. *东方翻译*, 2018(4): 77-80.

[13] 孙艳, 张旭. 中国翻译史的海外发声——基于九大国际译学期刊的考察(1955-2020) [J]. *上海翻译*, 2022(1): 53-59, 95.

[14]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M]. 刘绍铭等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15] 王文强, 汪田田. 译者翻译倾向研究——以邓罗和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为例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54-59.

[16] 朱永清. 太平道裂: 黄巾之变的内在理路 [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9(9): 5-10.